

内部资料 请勿转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主办

教育快报

(教育动态)

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324 期)
2013 年 3 月 28 日出版

本期导读

(专刊)

“两会”期间教育热点追踪

教育历来都是“两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期从热点聚焦、教育公平、考试评价、学生减负、素质教育、早期教育、职业教育七个方面摘录了“两会”期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 中国教育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

- 还孩子一个正常的原生环境，给孩子做梦的时间

- 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办法

- 大力扶持和发展社会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机构

- 传统的求同文化、榜样文化、关系文化等遏制了创新人才的发展

- 将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 中国发展民办职业教育需从四方面“突围”



“两会”期间教育热点追踪

热点聚焦

教育部部长：“我的中国教育梦”

在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在回应孟安明委员问道的“现在国家有中国梦，那中国的教育梦是什么”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动情地勾画了一幅自己心中理想的中国教育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

有教无类——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地域，不分老幼，每个人都能平等接受教育。

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特长，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学校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终身学习——所有的人都需要一辈子学习，哪怕你是博士毕业，哪怕你已经是教授。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当今的教育就是着手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中央提出的“学有所教”的目标任务。

人人成才——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教育要为每一个孩子播种梦想，点燃梦想，最终实现梦想，把自己的梦和中国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的中国教育梦！”袁贵仁加重语气地说。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3-3-8

清华大学校长：北京还应是世界的学术中心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代表建议，北京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这个世界城市不应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应是世界的学术中心。“这就需要促进北京的高校与区域发展进行深度影响”，比如说通过建立大型的科学设施、重要的文化基地，促进高校之间的联合、共享以及整体学术能力的提升。

清华大学有 110 个项目和企业有长期的研发投资合作。“大学不仅为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人才、科技服务、技术产品等，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环境、创新氛围。正是这些能够吸引好的企业将高端的产业和部门落户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陈吉宁发布一组数字称，“清华现在每年从国家拿一分钱的竞争性科研经费，能够带动清华科技园企业 2 分钱做 RD（科研），能够带动产值扩大十多倍的水平。所以清华和清华科技园对北京 GDP 的直接贡献每年在 3%-4% 的水平上”，北京现在大概有 89 所高校，其中 36 所是中央直属高校，全国将近 75% 的最好的学科集中在北京。这

样的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有这样的优质资源。

摘编自京华网 2013-3-7

翟美卿：关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受到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把推进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留守儿童公益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5800 万人。翟美卿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教育主要存在着 3 方面的问题：一是祖辈作为隔代抚养的临时监护人，难以担负起抚育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责；二是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沟通很少，亲子关系松散，他们中大部分有被忽视、被欺负的生活体验，容易造成心理和行为偏差；三是留守儿童的安全保障不足，校园安全事故、儿童意外伤害、女童受性侵害等事件在留守儿童中发生率较高。

针对上述情况，翟美卿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留守儿童公益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也可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防止留守儿童成为家庭教育的盲区，在实施中注意对留守儿童给予政策倾斜。与此同时，推进家庭教育功能进社区和乡村，将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作为社区居民服务中心重要功能之一，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各项公共服务建设和管理同步规划实施。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3-12

青少年体质堪忧 不根本改变将成国家之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表示，近几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进行的多次调研，以及教育部等六部委连续 25 年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一些重要指标呈下降趋势，令人堪忧，增强青少年体质刻不容缓。

杨桦说，中国青少年肥胖率日趋增长。与 1985 年相比，2010 年中国 7 岁至 18 岁城乡学生身高、体重显著增长，但肥胖率也增长了 7.9%，“小胖墩”越来越多。目前，中国城乡学生的肥胖率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10% “安全临界点”。

心肺功能下降，运动能力趋低。与 1985 年相比，2010 年中国 7 至 18 岁城乡中小學生肺活量下降了 11.4%，大学生下降了近 10%。中国青少年胸围越来越宽，肺活量却越来越小；身材越来越高，跑得却越来越慢；体重越来越重，力量却越来越小。

视力不良检出率不断攀升。2010 年，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视力不良

检出率分别为 40.9%、67.3%、79.2%、84.7%。中国“眼镜娃”的比例高、增幅大、低龄化，已居世界前列。青少年视力不良已导致征兵、航空、航海等特殊行业不得不降低视力标准。

“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形成的应试教育现状，必然以牺牲青少年体质为代价。”杨桦警告说，青少年体质下降的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将成为民族之忧、民生之痛、国家之患。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3-3-11

畸形英语教育“毁灭性打击”教育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认为中国应该制定科学的外语教育战略。张树华说，重视和学习英语只是一种手段，是基于我们改革发展的需要，一些教育部门和机构却本末倒置，将它当做了唯一的目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荒废正常的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汉语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以中文为母语的国家，英语居然成了我们在社会生存的资格和门槛，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学生在为学英语困扰无比耗费大量精力的时候，国外的学生却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只要自己不乐意就不用为学中文浪费哪怕一丁点精力。试问，我们的教育质量还怎么去跟人家比？这个意义上，学生因学习英语而荒废正常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恐怕绝非虚言。

当然，我们不是说现行教育体系要完全排除掉英语，英语毕竟仍是世界上被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但是，的确大有必要降低英语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低龄学生学好中文之前应该只是选修英语；在中考和高考中也该大幅降低英语的分值占比；而在大学以及考研中，只要专业与英语无关，就不应该拿英语来一刀切。

摘编自北青网 2013-3-13

代表痛批中小学课外辅导班乱象 有家长“站岗放哨”

对于举办中小学生的课外辅导班，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虽然早有明文规定，而且三令五申，但实际情况是，在很多地方屡禁不止。一面是家长的欲罢不能，一面是学生的望“班”兴叹。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马杰代表直言：“这种现象已成为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形成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马杰痛批中小學生辅导班日益泛滥的乱象——有的转入地下，有的暗箱操作，还有家长为隐蔽的辅导班“站岗放哨”，授课者大多是在职的教师，还有的辅导班更具针对性，有的是授课教师家中的“小班”，还有的是“一对一”辅导。

马杰曾作过调查：因为要报各种辅导班，一些家庭由此入不敷出，特别是工薪族、双职工家庭，基本上拿出一个人的工资(每月两千多元)都不够给孩子缴纳补习班的费用，“一对一”授课费用极其昂贵，一节数学或外语课，老师就要收数百元，严重存在税务漏洞，对于经济拮据的孩子家长，不得不向老人求助，被迫成为“啃老族”。

“针对辅导班问题，社会上呼吁声音很高，但解决起来显得软弱无力，逐步形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尴尬局面。”马杰说。

马杰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禁止公立学校将本校正常教育教学资源出租给其他办学机构办学。对于各类民办学校机构等举办的辅导班，应依法明确审批制度。教育部门应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公立学校在校教师将正常课程放到各类收费辅导班、补习班等培训活动中，一旦发现给予严惩。

摘编自《法制日报》2013-3-14

教育公平

朱永新：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办法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如何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首先让同一个地区的孩子尽可能接受均等的教育，再逐步在省市和全国范围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一，转变教育政绩观，把推动县区范围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作为保障社会公平的重大举措。要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办法，对地方党政领导的教育政绩首先看学校的差距有多大，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票否决制度”。同时，党政领导要带头执行“孩子就近进入义务教育学校”的政策，将“不批、不转择校”与“反对舌尖上的浪费”一起作为对干部的纪律要求。

第二，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标准。从缩小县区范围内校际差异入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按照相同标准配置所有学校的师资、基础设施、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生均公用教育经费，所有学校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所有学生必须达到基本的质量标准。

第三，强化省级统筹，深化教育及相关领域综合改革，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造条件。尽快实行义务教育“省统筹、县为主”体制，明确省级政府统筹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实行县区内校长和教师定期交流，建立区域内优质校和薄弱校之间的合并、托管等学校共同体，扩大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学生就读优质高中学校的机会。

代表委员呼吁遏制“名校独大”现象

“我国大多数县区的校际差异比发达国家还要大，相当一部分乡镇和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不到 40%。”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两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

校际差异拉大造成“名校独大”：动辄上万人的超级名校，好教师和好生源越来越多；周边的学校“失血严重”，越来越弱。名校借助高升学率，垄断了大量优质生源。众多利益之手助推名校膨胀，成为择校屡禁不止的“拦路虎”。在城市，小学、初中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校“大班额”和“超大学校”随处可见；在农村，基层学校生源减少、教师流失，父母进城陪读成风。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各学校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如今学校之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全国人大代表、赤峰学院副院长郭丽虹说，有些名校动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班级学生数几乎都超过规定人数。

在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看来，之所以“年年禁择校，年年择校”，关键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重点校、重点班。“解决择校，说简单也简单，没有重点校，哪来择校？”

“名校过度膨胀也不符合教育规律。”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现代教育追求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学校规模过大，教育服务的个性化水平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标准品”，不是“特色品”。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3-3-11

用“流动教育计划”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建议，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实施“流动教育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或“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进一步明确对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财政投资责任，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央承担为主、地方政府提供支持的投入体系。

首先，是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全国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信息联网制度，费跟人走。应尽快建立中央与省级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之间的经费分担机制，根据学生“电子学籍”的实时流动情况，形成一个中央、省级、地市、流入和流出地等政府的经费分担保障机制，做到孩子在哪里读书，他头上的教育经费就拨到哪里。

其次，可以探索实行“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为学龄儿童少年建立义务教育登记卡，当农民工流动时，这种卡连同流动人口的身份证、居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等“五证”一起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农民工子女随时入学的依据，同时也对农民工子女就读、转学情况实施监控。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12

考试评价

朱永新：教育要寻找正确的“指挥棒”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评价主要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系统内部，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科学性自然打折扣；考试与评价技术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与素质教育严重脱节，所以，教育评价“主体单一”、“模式单一”、“理论陈旧”、“技术落后”、“方法单一”、“功能单一”、“指标单一”等问题相当严重。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认为，可以借鉴国外教育评估的运作模式：政府主导监管、专业机构（社会第三方）设计实施。因为教育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

朱永新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社会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机构。这是一种专业学术机构，独立于政府和学校、或政府和招生单位之外。它承担的任务应该有：了解区域或国家教育现状，诊断教育突出问题；归因分析、跟进指导，为教育部门、学校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建构各类区域或国家大规模教育考试标准与评价机制；制订并推进区域或国家中小学生学业评价绿色指标，包括学业水平指数、学习动机指数、学业负担指数、身心健康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法指数、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家庭背景对学业影响指数和跨年度的教育进步指数；创新形成区域或国家高度一致的测评标准系统等，在操作层面上有效推进素质教育。

摘编自光明网 2013-3-8

南京大学校长：浮躁风已现 评价大学眼光要高远

“高等教育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已经出现。”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想克服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大学评价体系，评价眼光要高远。

陈骏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在获得发展良机的同时，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开始出现。整个社会总是期望中国大学很快成为一流大学，对大学的评价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主。这种风气导致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老师重论文轻育人。长此以往，大学必会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当前，亟须回归大学之道、坚守大学之本、重塑大学之魂。”陈骏说，回归大学之道，就是要坚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按大学规律办大学；坚持大学之本，就是要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现代大学多重功能的复杂矛盾中，牢牢把握住教书育人这一核心；重塑大学之魂，就是要坚守大学精神，面对各种利益诱惑，老师应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弘扬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陈骏建议采取两方面措施：

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大学评价体系。政府和社会评价大学时，既要关注大学直接的、短期的、显性的成绩，更要注重大学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评价周期不能过短；既要关注大学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更要关注大学在解决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方面的根本作用。

二要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大学文化生态。大学对社会文化具有引领作用，大学文化生态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希望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建设大学文化生态提供“正能量”。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6

俞敏洪：北上广推行异地高考难 歧视情况仍在

在回答记者关于“北上广推行异地高考为何难”的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说：“北上广目前推出的异地高考政策，本身就带有歧视性，比如北京的方案只是过渡政策，即使符合较为严格条件的随迁子女，也只能在北京参加中职、高职考试，尚未有放开本科招考的方案；上海则延续了一贯与居住证挂钩的思路，只有符合A类居住证的随迁子女，才可就地考取本科，其他类型的居住证，只能报考高职。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被异地高考’的人不满意、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另一方面，北上广的当地人对现状也同样不满意。”

摘编自光明网 2013-3-7

学生减负

人大代表：大学生不累中小學生叫苦 这不正常

“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小学、中学生都在喊读书苦、作业多，大学生从不喊读书累，而国外是大学生功课多，小学生很轻松，正好相反。”谈起学生课业负担这个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说，为中小学减负不仅是为孩子们快乐学习，而且要改变人才教育观念，只有更多大学生喊读书苦，才能有更多的创新科研成果出来。

顾海良说，中小学生学习多，不能简单地归罪于老师，责任在于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择校、择师热、课外辅导班繁多、奥数比赛等，有的是老师造成的，有的是家长造成的，也有社会舆论引导的。解决学生减负，首先提高教师素质，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而不是只重视考分高的学生。

摘编自《武汉晚报》2013-3-8

吴正宪：给孩子做梦的时间

“如果一个孩子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他怎样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在谈到小学生课业负担时，言凿凿、情切切。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做梦先得给孩子做梦的时间，我的梦想是让我们的学生和教师能够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孩子，还他们一个正常的原生环境。”吴正宪说，孩子们应当充分享受儿童的幸福，给他们足够的睡眠时间，给他们足够的玩耍淘气的空间和时间。

吴正宪说，减负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社会文化、用人制度、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她提出了自己的几条建议。一是提高教师素质，特别是加大对边远地区教师的倾斜；第二，应当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化，引导优秀教师资源分流到薄弱学校；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用自己的师德和人格魅力影响每一个学生，而不是只重视考分高的学生。

吴正宪说，除了政府应建立正确的评价机制外，家长也要克服攀比心理，清华、北大都只有一个，就像在运动场上，跨栏只有刘翔这样一个冠军。“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孩子都卷进来，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新闻舆论的导向也很重要，我们要为儿童营造绿色的成长环境。”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6

为孩子减负，得先为成人减负

一些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表示，学生减负问题可谓老生常谈，之所以“让人看不到希望”，说到底这不仅是简单的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社会文化、用人制度、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相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教师的考核机制和家长的的心态问题。

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代表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分数划分学生的“好坏”，更不能以分数、录取率来简单地判断学校、教师的优劣，给学生减

负，要先给学校及教师减负，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及社会观念全方面的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现在父母对子女考虑得太周到，对未来的蓝图构建得太完美，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这种理念被无限放大，结果就是给孩子不断加压。“实际上，现在的时代所强调的智慧，即创新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人才的造就。”他说。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7

代表热议“减负难”：课外班风靡 减负难落实

学校这边“减负”，课外班那里却在“加码”；家长对课外班一面是颇有微词，一面又是趋之若鹜。参加全国两会的几位吉林省教育界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表示，目前的“减负”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只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让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中小学生才有机会获得一个“合理的负担”。

“更喜欢放假还是开学？”新学期伊始，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小校长熊梅向她的学生抛出这个问题，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很多孩子告诉我，开学反而让他们变得很快乐，因为与要参加各种辅导班的寒假相比，开学后，孩子们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不少。”熊梅说。

摘编自光明网 2013-3-5

素质教育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遏制了创新人才的发展

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国作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却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顾问麦康森在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认为，阻碍我国人才创新能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求同文化、“枪打出头鸟”文化、榜样文化和关系文化在作祟。

“求同”文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麦康森认为，中国的科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性。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也跟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有关系。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创新性不是很强。

我们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到中小学教育一直到大学，听话的学生都是好学生。而与众不同的学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标准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不是创新。只有标新立异才是创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枪打出头鸟”让孩子不敢创新

麦康森指出，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目的都要追求高分。做练习题的时候也许

老师认可学生用另一个途径也能达到目标，但是他怕学生丢分，怕他冒不起这个风险，这恰恰扼杀了小孩的创造力。“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来的，家里家长说了算，学校校长说了算，班主任说了算，单位的领导说了算，所以这样的文化是不利于创新的。我想，中国的孩子也一样，他一开始也想创一番事业，标新立异，但是到处碰壁，那慢慢这个利器就没有了”。

“榜样文化”让人才培养千篇一律

麦康森说，中国人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就是榜样文化。我们天天提先进，树榜样。当然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榜样的文化。“同样是创新的作用，所有人向某一个人学习，那还是求同问题，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千篇一律的人，如何创新呢”。

须把科研人员从“跑关系”里面解放出来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花大量的精力去跑关系，天天要打通关系，精力都用在那里去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产品的创新。我们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也是一样，天天忙着跑关系，跑科研经费，应付检查，也没有时间来做研究。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的科技人员，对中国的老师进行第二次的解放。

摘编自中国网 2013-3-16

用“加减法”促素质教育落地

要使中小学生的书包真正轻下来，不能光靠一纸空头“减负令”，也不单单是时间上的强迫减负，要按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目标来设置课程，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让学生充分享受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建议，做足“加减法”，加强“情商”教育。

减法是什么？下决心削减过多过重的语数英理化生等课程，尤其要砍掉大量的课外作业和家庭作业，降低考试难度。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特色化教育，更多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应该意识到，要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上升到法律高度，并用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守住减负的底线，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切实做好减负。

减负后，空下来的时间干什么？这就要做加法，加强“情商”教育，注重中小學生非智力潜能的开发。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挖掘开发其非智力因素，与礼仪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使之课程化、实践化、家庭化、社会化。

摘编自光明网 2013-3-10

不能把学生当生产线上的产品

3月13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做客人民网教育频道，他认为，目前教育教学有点像批量生产，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是生产线上的产品，这对创新人才培养是不利的。

李培根介绍，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如果想真正地深化教育改革，需要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改革。

李培根认为，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有一种模式化的倾向，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式，也有一种模式化的倾向，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有点像批量生产这种方式，学校把学生当成是生产线上的产品，这对创新人才培养是不利的。“我们从实现中国梦这个角度，未来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也需要一批杰出人才。这样的人才的培养，我们如果在模式化教育理念里面，是难以培养出来的。”

摘编自中青在线 2012-3-14

体育勿成学生新的应试负担

在全国两会上，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再次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和讨论。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提出，应当发挥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将体育内容纳入高考，从而提高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业内专家表示，体育成为考试内容，固然有助于提高体育在学校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但也要避免让体育成为学生新的应试负担。

“重要考试中增设体育内容，必须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研究中心主任吴健表示，“首先是考试的形式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现在，中考有体育科目的省份，基本上还是采取以体育考试分数定成绩的模式，但学生因为先天条件的差别，很难以跑得多快、跳得多远作为评判学生是否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标准。要将体育考试与体育竞赛的评价方式区分开来，我们建议，只要一个学生在适当努力参加体育锻炼，身体达到健康标准的情况下，就应当能够在体育考试中得到满分或较高的分数。否则，体育考试会给学生造成对分数的过高追求，最终成为学生新的应试负担。”

对体育考试分数的分分必争，又容易造成学生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急功近利，“如果学生为了考试分数，造成身体受伤甚至发生意外，这岂不与教育部门设立体育考试的初衷背道而驰？”吴健表示，体育考试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水平作为考试成绩的依据，而不是像体育竞赛式的用多快、多远等运动成绩来衡量学生体育运动水平。但现在，还没有哪个省份是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作为体育考试的手段，这个工作还需要逐步推进。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3-10

马敏：孩子不是考试机器 教育不是百米冲刺

“大学的东西中学学，中学的东西小学学，小学的东西幼儿园学，幼儿园的东西从什么地方学？胎教！”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素质教育提出多年，却仍然没有落到实处。

马敏痛陈当下的应试教育：层层拔高，层层加大难度，为了拔高不断加内容，考试加难度，致使孩子们负担越来越重。马敏说，素质教育从 1985 年就已经提出，但推进艰难。实际生活中，推行素质教育走进了多个误区。

一个误区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家长总是认为孩子如果冲刺没搞好那今后就完了。实际上，孩子的教育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

另一个误区是素质教育就是学弹琴、学唱歌、学画画、学写字。实际上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

第三个是政绩的误区。很多学校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评判一个老师好与不好，就是看班上的升学率如何，而不注重孩子自身素质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学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14

早期教育

政协委员建议将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各地逐渐兴起的幼儿园亲子班、连锁早教机构等五花八门，且处于监管真空。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学春就此提交提案，呼吁将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并对早教市场规范管理。

李学春在加强 0-3 岁婴幼儿早教市场规范管理的专题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对 0-3 岁孩子的早教，由于无主管部门，未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尚处监管真空。在工商备案的早教机构中，如果注册名称中出现早教、幼教将不予批准，经营范围中也不得出现早教字样。而以教育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或是亲子园、教育培训中心的名义注册，则无需准入门槛，很多社会力量开办的早教机构就以这些名义注册运营。

李学春就此建议，尽快明确主管责任部门，尽早制定社会力量举办 0-3 岁早教机构的管理办法，对各类早教机构的教育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切实落实监管职责。建议研究制定 0-3 岁婴幼儿早教课程的评价体系，规范课程设置。力争实行 0-3 岁婴幼儿早教师资准入制，并纳入教师职称体系，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

摘编自《重庆日报》2013-3-13

全国政协委员：民办幼儿园教师应持证再上岗

近年来，关于幼儿园教师体罚学生，甚至致伤事件时时见诸媒体。全国政协委员、台盟陕西省委专职副主委王二虎提案建议，对现有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培训，取得上岗证后方可任教。

王二虎指出，由于现在公办幼儿园少，催生了一些民办、低水平的幼儿园，幼儿教师严重不足。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一些幼儿园教师“先上岗、后考证”，导致部

分幼儿园教师文化素质低，业务能力差，无法胜任幼儿教育重任。

王二虎建议，要重视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素质问题，提高幼儿教师入园门槛，在审核录用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幼师必须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另外对现有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回炉”大培训，取得上岗证后方可继续任教。

王二虎同时提出，应重视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给予他们评定教师职称的政策，并享有公办教师待遇，从而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水平和能力。

摘编自北晨网 2013-3-12

职业教育

中国发展民办职业教育需从四方面“突围”

民办职业教育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补充力量，近年来虽然得到发展，但也遇到一些新问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指出，民办职业教育是教育链条中相对薄弱环节，要促进民办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应从四方面“突围”。

一是鼓励多元办学。注重开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业证书的培训。同时，满足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拓展民办职业学校功能。

二是出台相关扶持和管理政策。明确兑现办学自主权政策，保证投资者的政治地位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明确减免税费政策，同时，出台相关评估办法，定期开展评估，汰劣奖优。

三是给予公平待遇，明确民办职业学校教师应享有事业单位待遇和受教育者享有合法权益的政策。

四是设立民办职业教育政府专项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对那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取得任何经济回报的民办职业学校实行经常性财政资助。

摘编自新华网 2013-3-16

优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必须优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样才能保障城镇化健康推进。”

严诚忠认为，应按照在 2020 年之前全国每年城镇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的节奏及时规划与布局义务教育的配套跟进方案。只有子女就学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才真正称得上“落户”的效果。城镇化有利于原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真正实现均衡化。因此要做好“义务教育后”的人才开发规划，通过区域内外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与利用，有效引导区域人才发挥本土化特长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他希望注重“顶层设计”，以人才开发为导向，探索以创新的思路建立具有多种

层次与机制的有助于城镇化“转型”人员素质提高的教育平台。其中特别要强化的是普法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教育。

他表示，现在教育经费相对充盈，“但其投资结构应向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优化的方向倾斜”。否则，仅靠现有的理论学术型导向的高等教育，很难产生大批应城镇化之需而培养的应用型人才。

摘编自科学网 2013-3-5

马国湘委员：创新创业教育必不可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马国湘在两会期间对记者说，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传统意义上促进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技术、技能和创意正在成为新的三大驱动因素。创新是基础，创业是途径，发展创业型经济日益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主流。

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创新创业教育必不可少。发展创新型经济、推进创业型社会，关键在人。为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大学开设创业型课程，继续实施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型实验计划和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的精神教育；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把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3-14

责任编辑：商发明 李志涛 邹 敏